

English Literatures and Cultural Studies



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

易晓明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

主 编 易晓明

副主编 庄美芝 尹文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易晓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18000-6

I. 英… II. 易… III. 英语-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408 号

书 名: 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

著作责任者: 易晓明 主编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00-6/I·22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om>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22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影

代 序

文化研究无疑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具冲击力的学术新潮,它波及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等等。文学研究的生态因它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围绕着文化研究这个新的闯入者,学界已经掀起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论争,而且至今似乎也未见其消歇的征兆。究竟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威胁劲敌,还是救世福音?再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历史地检索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需要回到英国学统的“文化研究”,因为它也是如今风靡全球的文化研究的一个策源地和一个典范,特别是英国的文化研究与英语文学研究有着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

一、经典“文学”传统的建立

就英国学统而言,“文化”一词,作为核心概念进入理论领域或者说作为思想阐释的目标性术语,始自19世纪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尽管威廉斯也说过,从柯尔律治时代起,“文化”的观念(*idea of Culture*)就已进入英国的社会思想^①,但在那个时期,人们只是一般地使用“文化”一词。与此不同,阿诺德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则是自觉地考察“文化”的涵义,将“文化”作为专门的领域来考察。他认为,“文化”不只是追求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进而提出了“文化的信仰”的概念。他说:“文化之信仰,是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文化的核心是“完美”,“文化即对美好的追求”,文化是“美好与光明”。^②当时工业化时代的英国人热衷于机器化,即致力于达到工具、手段的完美,阿诺德与此相对,倡导心灵、心智的完美。可以看出,阿诺德对

① See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enguin Books, 1982, p. 74.

②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8—9页。

“文化”的标榜凸显并确立了文化对于功利化世界的超越性特质:文化乃是一种超越世俗功利、达到心灵完善的方式与境界。它与文学相关,阿诺德将“诗歌”视作“文化”的精粹。

追随阿诺德的文化概念,T. S. 艾略特在《文化定义杂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1948)中,将文化从个体的心智活动一直拓展到社会,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阿诺德的“文化的信仰”,视文化具有可以替代“宗教”的救赎功能。其名诗《荒原》就是文化替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拯救药方。

F. R. 利维斯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与阿诺德和艾略特具有一致性的立场。既然文化是智者的心智活动,既然文化具有超越性的拯救力量,文化的超越性来自于它所具有的先知性与引导性,那么,在利维斯看来,它就一定是少数精英所生产出来的,然后才向大众传播。利维斯指出,这极少数人就是文学家莎士比亚、康拉德等,以及那些能够鉴赏这些文学家的人。因而在利维斯这里,文化被具体为“文学”,一如阿诺德的“诗歌”,文学经典居于文化的核心,成为引导社会的航标。

“文化”何以自阿诺德突然被提升至如此显赫的位置?应该说是阿诺德敏锐地感知了时代的问题与对文化的需要,文化因此才前所未有的地被推崇并被赋予一种新的使命,即对抗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实用化与功利化倾向。当时功利化与实用化不止是工业化过程中一般民众的取向,更为令阿诺德忧心的是它也是英国政府的导向,还是整个社会的导向。甚至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这样的大科学家都主张将百无一用的古典教学(古希腊罗马)从大学课程中删去^①。阿诺德逆势而独立,高扬人文精神,他将实用倾向的庞大的中产阶级讽刺为“非利士人”,坚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转型期英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平。”^②

文化被定位在作为现实的根本精神出路,因而成为不可取代的重要领域。自阿诺德以来的英国知识分子大都坚守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他们极力建构文化的自主疆域,以此对抗现代转型期的工业文化、

① See Matthew Arnold,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Discourses in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 1912.

②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171页。

技术主义、工具论及实用主义社会潮流。客观地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这批知识分子不懈的文化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阿诺德的著作一直是社会批评的一个标杆,而艾略特则在文学创作领域引发了对现代工业化社会精神荒原的注目,传统文化成为精神的象征。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对文化自主疆域的确立过程,对应于工业化时代精神危机的过程。其中对精英文化,经典文学在制度层面的确立,利维斯厥功甚伟。剑桥大学于1917年创办英文系,自此英文系在高校的学科建制上全面铺开,利维斯后来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将“文学”文化实施于大学体制,无疑使文化有了营垒与扩张的阵地。利维斯在其《教育与大学:英语学院的设想》(“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1943)以及《我们时代的英国文化和大学》(“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 1967)等文章中,不断强化英语系与英语文学、与大学人文教育之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经典在大学里获得了学科化地位,并由此推广于社会的国民教育之中。

利维斯的文学文化的大学教育理念,首先来自利维斯坚持文化与语言的不可拆分!他认为能够鉴赏作家的极少数人,他们保存的是语言、变化的习语,因此,“文学”文化的保存,主要靠语言。这就使得英文系担负语言、文学与文化一体化,同时,担负起大学文科教育的人文教育功能。英文系的大学建制的基础在于为社会培养健全的有道德的公民。利维斯深情地说:“‘英文’……是一所人文学校(a humane school),各种不同的研究都可在非-专业化的智性(the non-specialist intelligence)中找到它们的中心,非-专业化的智性就是在文学的特殊训练中获得一种智性。其特殊而非专业化的训练在于它属于文学批评,一种敏悟性、判断力和思想的训练。”^①在利维斯这里,“英语”、“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等术语几乎具有同一涵义,而这些都属于非专业化的“人文教育”。顺带指出,由于如弗莱所说的文学不可教,而可教的只是文学批评,20世纪见证了批评理论的兴盛,这也与英文系的大学建制不可分开,也有文化理论家们的功劳。这是一场“文化”的胜利,抗衡于工业化过程。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的胜利,导致的另一个战利品,乃是经典文学获得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因为它们被推到了社

① F. R. Leavis,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3, p. 43.

会教化的位置上。

利维斯抓住文学的道德关怀与人文关怀,这是使英语系得以确立的核心,是人文教育的基石。文学包含的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与阿诺德“怎样生活”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个道德问题)相一致,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大学教育的问题,英文教育与大学人文教育密不可分;而大学又是文化传统的象征,进一步,文化传统存续于英国文学传统之中。“英语”作为一个科系的兴起,就这样萦绕进了文化研究。

二、“文化”内部的分裂:精英的“文学”与大众的“文化”

到了20世纪后期,电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写整个社会的文化版图,电子与影像使大众文化开始入主文化“中原”。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精英文化观念遭到严重挑战,英语系也因此而受到冷遇。这是一次全然不同的文化巨变!如果说阿诺德、利维斯曾经面对的“文化危机”主要来自于外部,即来自于工业化时代的机器文明,如利维斯所惊愕的,“机器越来越势不可挡”^①,“传统垮台了,文化被连根拔起,正在枯萎”^②。20世纪80年代,技术则不再以机器的形式外在于生活或分离于文化,而是深入到生活形态与文化形态之中,如复制技术、影像技术等使生活与文化都具有了技术化的特征。生活与技术、与文化相互渗透,技术潜身于文化,也潜身于日常生活之中,技术与文化、与日常生活已经纠缠在一起。这大大地扩展了文化的地盘,也改变了文化的精英文学的形态。这一次的文化危机因而不是从工业化的文明领域,不是从文化之外的技术文明领域,而是从文化之内部爆发出来的。精英的“文学”与大众的“文化”,无论如何,都在“文化”内部。而且新的大众文化,或工业文化来势凶猛,它不仅在文化内部引爆了叛逆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形态,也引起了一种非文学化的文化研究的勃兴。

当然,大众文化也好,文化研究也好,仍然是“文化的”,然而它们却已经从传统的精英的“文学”文化的场域游离开来,脱离出来,落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层面。文化研究一方面为通俗文化张目,要求一个“文学”的礼遇,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其曾经寄生的文学,特别是对精英

① F. R. Leavis, *Valuation in Criticism and Other Essays*, ed. by G. Sing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6.

② F. R. Leavis, *New Bearing in English Poetry: A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2, p. 165.

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持对抗、挑衅和反叛的姿态。如果说通过英语系的体制化,利维斯曾经成功地抵制了工业文明的话,至少与它取得过一度的抗衡,那么面对电子时代,技术之深入到生活与文化本身,技术、生活、文化之融为一体,技术的生活化、文化化和审美化,使新型的具有生活形态特质的大众文化,构造了与智性的精英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符码,那么继续用精英文化、经典文学来抵制新的电讯—文化的兴起,则显得隔膜、绵软,甚至无效。从理论上继续用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甚至保守精英文化立场,来批判电子文明—文化的崛起和风行,则从理论上也就难以服人了,更不用说有效指导实践了。

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在文化内部引发的分裂,体现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裂,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它甚至还使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少数人的精英文学,成为遭抵制的过时之物,导致传统的精英文学的迅速衰落。因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一触即发。文化研究各流派激起传统文学研究守望者的不满,我们知道,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有着著名的“憎恨派”之讥。传统文学研究与新型文化研究之间的鸿沟在于,文化研究迎合大众与通俗化,抛弃了经典文学的社会批判与审美超越,失落的是传统文学批评的道德、审美与人文关怀的立场,它们与日常趣味或意识形态合流。因而,文化研究开辟了自己的视域,且同时也搅动了“文学”的世界,在西方一度鼓动起重构文学史与重读文学经典的浪潮,结果经典的范围被大大地拓展了。1990年代,这种斗争似乎渐渐以文化研究的获胜而稍歇,其中一个表现是,希利斯·米勒悲悼文学的衰落,其近作《论文学》^①对什么是文学进行了扩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再启动和神话般的迅疾展开,一个消费文化时代已经演变为我们最日常的现实。商品的符号化,符号的商品化(波德利亚);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杰姆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费瑟斯通);整个社会的“娱乐化至死”(波兹曼)——这是文化的理论,也是当代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研究1990年代引入中国后,便不断掀起一波一波的浪潮。“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艺学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成为最先的觉悟者,他们一方面投

① J. Hillis, Miller, *O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身到对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引进,另一方面也热切地开拓和建构着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事业。同英国曾经的情况一样,这也激起了中国文艺学界两种立场和学术潮流之间的论争。在外国文学领域,冲突不是那么明显,表现为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学者对新兴理论研究者的不屑,前者抱守古典的审美的高雅,情感的细腻,反感于理论的抽象和生硬。作家作品研究与理论化研究两种倾向会在各类学术会议上时有较劲,平时则表现为一种潜在的趣味和情绪的对抗。

三、文化研究的时代必然性

熟悉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中外论争背景,我们能审视出文化研究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其兴起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首先,如上指出,大学英语系的建制是为了应对工业化时期机器文明所导致的文化断裂;而电子时代的技术文化则引起了生活形态的改变。利维斯那代表极少数人的精英主义的英语系因此不再能够承担新的历史转型期的文化使命。而“文化研究”进入大学,可以看作类似当年英语系的建制,它是为了应对新的“文化危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很多文化研究学者都提到文化研究在大学体制中作为一个“新来者”(New Comer)的作用,譬如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说道:“文化研究作为学术和知识交易所的新成员,必须努力争取支持投入和学术产出,以迎接面临的竞争压力。人文学科领域的老牌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都在这同样的竞争中已经脱颖而出,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地位。”^①

第二,从英格利斯以上言论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作为大学新成员,同时也是作为学术市场上的新成员,追求投入与产出这一新目标;这种与现时期的文化形态的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专业化、学科化理念,同阿诺德与利维斯所倡导的少数人的心灵智性形态的精英文化之间已经出现了不止是差距,甚至是对抗,文化研究融入世俗化的学术交易所,追求产出;而精英文化只是高雅的曲高和寡,追求鉴赏、陶冶与自怡。

第三,从学科目标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大学的体制与功能的变化。在利维斯时代,大学要成为文化的中心,引导社会的价值观;而在当下

① Fred Inglis,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8.

的文化研究时代,大学的各个学科以自身的专业化为目标,求得自己的专业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瑞安·毕肖普谈到了文化研究进入到大学体制后,以保身的犬儒姿态取代了批判性的文化目的的诉求^①。传统的精英文化所追求的人文道德关怀,对民众的引导,对社会的批判,在当下大学体制的新兴的文化研究学科中失落了。这种体制也就导致了阿诺德,甚至也包括利维斯(因为他一直是在剑桥没有获得正式教职,最后几年才成为讲师)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新型的知识分子学者,都是大学体制内的专家,同时也带着市场文化的烙印。如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就描述了作为社会批判力量的公众知识分子之退出历史舞台,并指出现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专业化的专家而已,是市场文化交易所的产出者。他们不再被看作阿诺德所推崇的“社会的少数正直者”^②,也不再具有利维斯过去所推崇的极少数人的高雅,知识分子不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文明的引路人、预言家和权威。

第四,或许我们可以套用黑格尔的说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体制内的专业化追求确实与大学教育的普及有关。文学、文化与大学仍然纠结在一起,利维斯时代的这个老话题还在。然而其中的文学、文化变了;同样,大学的现状与功能也变了。因而再固守传统的少数派的精英文学的人文主义立场将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在利维斯时代,英文系的确立,使英语系在讲英语国家的人文学科中获得引人瞩目的兴盛,而那些由于不具有多少道德力量,不能直接地担负起道德关怀、人文关怀、抗衡机器文明之历史使命的学科如拉丁语等这样的古典语言学科,则被推向边缘。在文化研究到来的时代,经典文学研究或许也将难逃当年古典语言研究衰落的厄运,传统的文学研究同样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对新的文化形态的阐释,面对道德感日益淡化的市场文化即大众文化,持守道德关怀的经典文学研究正在走向没落。米勒感叹:“文学正在走向死亡的途中”^③。当然米勒这里指的是传统的近代以来的文学,即担负教化理念的文学,并不是通指所有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早几年国内围绕米勒“文学死亡论”的

① 瑞安·毕肖普:《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张士民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唐纳德·斯通:《阿诺德的中国少数者》,《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③ J. Hillis, Miller, *O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

争论,其实并未辨清米勒“文学”概念的具体所指。在西方,只是近代以来的“文学”才开始被赋予道德教化的强大功能;因此,事实上,也是像狄更斯这样带有道德使命感的文学家衰落得最快。

四、文化研究之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和文化的疆界,不仅从前的文学文本,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的文本,社会的文本,都被纳入学术的视域,这无疑应合了英国文化理论家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文化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与生活是一体化的,生活即是文化,而非只有“知识的、精神的”活动和产品才堪称“文化”。

文化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变革意义。首先它不是绝对主义的,不是一种理念主义的标准化的价值观,它是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灵活的思路,因而也是具有极强包容性的一种研究方式。它一扫过去人文学科研究中围绕某种形而上学的价值理念诉求的单一的、固化的阐释模式的沉闷与僵硬,更多地将从一种理想的状态降至其现实层面,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表意方式,从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方方面面的呈现。英格里斯指出“文化的学子拒绝客观科学家的立场”^①;“当主体与客观之间、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之间处于僵硬对立的时候,纽约的相对主义被适当地调遣来,以在主体间共通的人类世界中以及被强烈赋值的日常事务中,通过抵制它们而软化这些二元对立的僵硬”^②。英格里斯所说的正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意义。

文化研究方法的新调遣,柔化了旧有哲学社会理论的僵硬,从而也调整与激活了已有的各种固化的研究思路,形成了活跃的文化研究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的方法也渗透到英语文学的研究之中。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少数族裔批评等都被应用于作家作品研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大多带有一种文化理论去分析一个文学对象的分散研究状态。有无可能进一步,自觉地从各种文化理论出发对文学进行不同的系统性研究?这是有待思考的问题。文化研究带给我们广阔的学术天地,也带给我们众多的研究的潜在途径,我们须以开放的姿态来探讨我们自己时代的新文化,同时积极回应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的新挑战。

①② Fred Inglis,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x.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冲突与论争的历史语境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选取了“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这个热点专题,组织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它具有前沿性与时效性,其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冲突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现实问题;其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利维斯确立英文系在大学里的建制开始,英语文学就与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就萦绕在一起,再加上英国作为最大的宗主国,后来英语文学构成了殖民与被殖民等多重文化研究涉及最多的领域;其三,文化研究起源并至今兴盛于英国,同时文化研究于作品的应用研究也最为普遍,因此,选取“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进行学术会议的探讨,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来自六个国家的一批从事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理论研究,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各方面的学者提交了论文,并热烈探讨。

由于篇幅等各种原因,有不少优秀参会论文没有收入本论文集。譬如北师大刘洪涛教授的《徐志摩与剑桥文化传统》,语言文化大学陆薇教授的《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哥特叙事》,以及北大陈晓明教授的《“憎恨学派”与“后左翼”的复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孟登迎教授的《亚文化概念的形成》等等。已收入的论文分为五个专栏,本次会议的成果多元而丰富,从中也可以窥见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与关联。然而,由于能力有限,肯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希望本论文集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引发读者对当前这一热点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易晓明

2009年12月

目 录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

- 文化研究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王 宁 (2)
- 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
- 文化研究 瑞安·毕肖普 张士民 译 (18)
- 文学与文化的论争与转向 约翰·菲利普斯 王行坤 译 (25)
-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
- 批评与文学分道扬镳 易晓明 (31)
- 站在不同擂台上的对手
- 哈罗德·布鲁姆与“憎恨学派” 高 永 (38)

英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 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及其对当今
- 批判理论之意义 雷纳·温特 王行坤 译 (48)
- 离合之旅: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考察 黄卓越 (55)
- 抵抗的力量决非来自话语层面
- 对霍尔编码/解码模式的一个批评 金惠敏 (69)
- 文化自觉与文化批评的新契机
- 阿诺德·利维斯、威廉斯对我们的启示 曹 莉 (81)
- 阿诺德的救世之道:“诗”与“美”
- 贺清滨(Y. Ben Ho) 孔令博 译 (97)
- 文化主义与利维斯主义 张瑞卿 (126)

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学关系研究

- 西方文化中的宽恕主题 唐纳德·斯通 吴远林 译 (136)

2 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

- 朱迪斯·巴特勒的后女性主义理论 李庆本 (154)
- 德勒兹与少数文学的力量 托尼·希 (165)
-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认同观对文化研究的挑战 刘长荣 (174)
- 文化研究与影像叙事理论 马 婷 (189)
- 可见与不可见:福柯的视觉思想探析 董树宝 (195)
- 话语抵抗与语词游戏
- 试析霍米·巴巴“杂合性”理论的双重面孔 钟厚涛 (207)

外国经典与外来的文化研究在中国

-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陶东风 (220)
- 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曾艳兵 (253)

文化研究视域中的英语文学研究

- 从英印—英国小说家玛甘达雅小说《杯中之蜜》看当代印度的
社会女性文化状况
- [印度]西蒙·德(Sima De) 王行坤 译 (266)
- 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美国华裔女性身份的重构
- 蒋宇红 李 茜 (271)
- 加拿大犹太文化变迁之写照
- 解读《达迪·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 段 慧 (278)
- 混合身份认同
- 奈保尔《抵达之谜》解读 周 敏 (286)
- 试论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宗教意识 黄 华 (296)
- 后 记 (306)

文学研究与文化 研究的论争

文化研究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王 宁

在当今的西方及中国学术界,令文学研究者倍感困惑或茫然的一个现象就是,自己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之领地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因而变得日益萎缩。文化研究大行其道,大有取代文学研究之势。显然,对于这样的挑战,不同的学者抱有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出于对文化研究的偏见,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使得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地大大地萎缩了,也有一些思想观念较为开放的学者则认为这二者并非天然对立,如果协调得当,也许会使得二者都有所受益,从而形成一种对话和互补的态势,如此等等。究竟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由于我本人同时从事这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探讨这二者的辩证和互补关系自然责无旁贷。

文化研究:扩大了领地的文学研究

首先,我从一个英语文学研究者的角度必须指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文学研究延续而来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它所经历的就是从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过渡。当然,在过渡时期,任何偏激的和矫枉过正的做法都在所难免,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难以解脱的渊源关系是不证自明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日趋终结、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逐步步入前台之时,一种长期以来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学术理论话语就开始了消解中心(decentralizing)和破除领地(deterritorializing)的运动。到了90年代初,这股大潮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它就是我们现在论及的“文化研究”。本文所说的文化研究

自然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更多指向大众文化以及各种非精英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精英文学以及文学研究或者被束之高阁,或者被边缘化,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越来越远离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非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此外它的跨学科性又是十分明显的。一般来说,介入文化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这样几个学科领域:文学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以及传播学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领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这就势必涉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些文化研究主将们的学术背景,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不少人的头衔就是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们所赖以崛起的领域也是文学研究,因此这二者的对立并非天然形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就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径来看,它明显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ethnic studies);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以及以考察研究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为主的大众传媒研究(media studies),尤其自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与文学研究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也许正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抱有恐惧甚至反感态度的部分原因。

文化研究在保守的欧洲学术界颇遭非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如有些文化研究学者所承认的那样,“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①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有了差别,换言之,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②,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

① S. During ed.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

② Ibid., p. 2.